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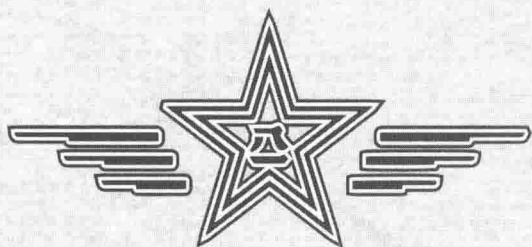
强军讲坛

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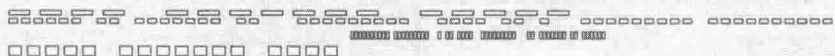
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 编



人民出版社



强军讲坛



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曹 歌 刘江波
责任校对：吕 飞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严淑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军讲坛 / 程宝山 主编；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 编.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7-01-018022-9

I. ①强… II. ①程… ②中… III. ①军队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E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0675 号

强军讲坛

QIANGJUN JIANGTAN

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64 千字

ISBN 978-7-01-018022-9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伟大改革的精髓·····	胡光正 许今朝	001
军事改革与理论思维·····	李际均	015
论思想解放与推进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改革·····	张树德	020
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若干思考·····	刘江桂 韩卫锋	032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若干机理探析·····	任天佑	047
推进陆军转型建设的几点思考·····	石忠武	064
我军现代后勤建设的历程、形势和任务·····	李平俊	077
积极推进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	张东江 刘洪顺	092
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周边安全·····	王宝付	104
人民军队信仰纵横谈·····	姚有志	114
论重新树立我军政治工作威信问题·····	王幸生 韩金强 乔翔	124
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开掘与再造·····	赵 丕	135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研究·····	张军果	147

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军民深度融合·····	江 英	160
论制时间权·····	黄 琨	173
军事因素与大国崛起·····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196
美国东移与中国西进·····	乔 良	210
加快推进军工强国建设 强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林左鸣	230
从美国加速建造高新航母论中国航母战略发展走向·····	李 杰	238
国家安全：安邦定国的基石·····	彭光谦	251
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姜春良	259
甲午战史和中日关系演变的回顾与反思·····	徐 焰	271
后 记·····		283

伟大改革的精髓

——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胡光正 许今朝

2015年11月24日注定是个难忘的日子。我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体性革命性改革从这一天起全面展开。“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这场伟大改革的纲领，庄严而夺目。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是理念原则也是宏伟蓝图。称其为理念，是因为它所带来的是一次思想的汰旧立新，有碰撞有交锋更会有思想的大解放，它被用作指引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前进的总原则总遵循；称其为蓝图，是因为它所展现的是一次脱胎换骨般的组织大改造，有博弈有争论更将有大破大立后的华丽转身，它被用以勾勒改革框定的总格局总架构。

理念指导蓝图，原则成就格局。

一、军委管总，铸强战略中枢

“军委管总”表征了我军统帅机构的权力形态，即我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由军委集中统管，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重大战略举措。军委的核心职能在“管总”，是在战略层次上全面统领军队作战指挥和建设管理，目的是为强军打赢，重构战略中枢。

（一）“军委管总”是确保军权高度集中统一的客观要求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凡兵之道，莫过乎一”。这里所谓“一”，类似于“兵权贵一”中的“一”，指集中统一、统一指挥。军队是要打仗的，兵权不集中，就打不了仗，更遑论打胜仗。军权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尤其是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权必须集中于统帅。“统帅掌兵”可谓是军事领导指挥艺术的基本原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拿破仑曾说：“在战争中没有比统一指挥更重要者。”毛泽东亦强调，军队指挥的决定权要高度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统帅机关因统帅而生。战争机器的进步、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场空间的拓展，为统帅机关的出现、壮大、发展和成熟提供了条件。没有统帅机关的辅佐，统帅将孤掌难鸣，统率“三军”更难以实现。

军事领导体制的演进同样揭示了统帅机关是统帅集权的凭借，统帅集权必先予统帅机关统管之责，唯统帅机关集中地管，统帅集权才名实相符，统帅掌兵才有依托，才具权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陆续筹组国防部作为统帅机关，目的即是实现军事领导指挥权的统一，为统帅有效执掌武装力量打牢组织根基。在美国，宪法规定国防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总统，总统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国防部由国防部长领导，国防部长是总统处理一切与国防部有关事务的主要助手，并对军事部门拥有法定的领导、指挥与控制权。

在中国，中央军委是武装力量的统帅机构，是军委主席借以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落实“军委管总”，就是要强化军委对武装力量的集中统管，使最高领导权指挥权更好地集于军委掌于主席。

（二）“军委管总”是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必然要求

执政必先执军。我军建设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建军史，是一部坚定不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队发展史。克劳塞维茨曾讲“军事是政治的

继续”，毛泽东也曾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是为政治服务的。我军这支“枪杆子”，是专门为党的事业——解放民族、解放人民、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服务的。从“三湾改编”创立“支部建在连上”开始党对军队的政治掌握，到古田会议确立党的政治建军原则；从遵义会议确立党在军事领导上的正确路线，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率领全军赢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统一军事领导制度的初步探索，到“八二宪法”军事领导制度的巨大进步，不仅实现了中央军委在党和国家层面的一体化设计，还科学性预见性地创设了“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可以说，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我军都高度重视从政治上牢牢掌握军队，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始终得到落实，高度重视党对军队最高领导权指挥权的掌控，确保最高军事领导权指挥权始终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新的历史时期，确保“枪杆子”始终听党话，确保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关键是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建强军委，落实“军委管总”，从顶层上强化军委对全军的政治统领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实现军委“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的有机统一”。

（三）“军委管总”是固强中枢确保打赢的战略选择

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现代战争正由机械化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形态演变。海湾战争以来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信息化战争已然披挂上阵。要想打赢，就必须先跟得上战争形态的跃变，熟知战争制胜机理。信息化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手之间精良武器的体系对抗，拼的是系统间要素间的整体联动，“系统集成”是发起攻击的轴心线。谁“最能翔实掌握战场情况、最能有效地在自身各要素间传递信息，并能更快、更准、更远地使用武力”，谁就将获胜。

“胜负的关键取决于职能互动与协同的能力。”这就要求，打赢现代战争必须有强大的统帅机构和指挥中枢来统领，要求后者既有足够的权威和

权力，对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情报信息等必要的战争资源统筹调动和运用，又有高超的战略规划、管理、决策和指挥能力，确保能看得远、指得准、联得快、控得实。

现代战争是联合战争，没有强大的统帅机构，“没有战略集权，就不可能实施联合作战。”邓小平曾向全军发出“两个不足”的诘问，若究其源，恐与军委集权功能弱化不无关系。落实“军委管总”，就是要强化军委集权和战略统领，真正使军委统起来、实起来、强起来，始终居于战略的制高点，发挥好战略统领功能，为统帅掌控全局、决策打赢服务。

（四）“军委管总”重在“管”好“总”

所谓纲举而目张。“军委管总”即是总原则、总格局中的纲，是大前提；“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则为目，是小前提。目随纲生，纲主目从。“军委管总”就是要拉好这个纲，建好这个大前提，真正实现“主建”与“主战”的战略统筹。

在这个意义上，军委的“管”是最高层次的、是战略全局上的“管”，而非战区、军种层次，非具体战略战役甚至战术上的“管”，是宏观的“管”而非中观、微观的“管”。军委的“总”即是“统”，是“战”的职能和“建”的职能的“统”。统得好则威，相反则弱。此外，“总”也预示着“分”，“分”是“总”的延续。为何分，分的原因是什么？从现代国家军队建设发展的实际看，盖与现代军队愈发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耗散性的巨系统有关。现代军事强国不仅作战指挥系统资源配置运用日益复杂，建设管理系统也因分工更加精细而愈加庞大。“分”的关键在“建”与“用（战）”的分离。当然，“分”的目的是为促进专业化的“建”、联合化的“用”。

“分”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更好地“总”，即确保对军队的政治掌控。比如就美国军队而言，形成了在最高当局统一领导下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完全分离的体制，即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作战指挥和建设管理的全局，战区司令部和职能司令部负责作战筹划和指挥，军种负责所属部队的人事、训练、装备、编制、经费、后勤等行政业务，并向战区司令部司令提供参战部

队。俄罗斯军队则形成了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适度分离的体制，即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军队建设和运用全局，总参谋部负责战略筹划和战略指挥，联合战略司令部负责指挥战略方向联合作战，军种司令部主要负责本军种部队建设。

从我军情况看，落实“军委管总”，目的是要形成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相对合理的“分”的体制，即形成军委—战区—部队的联合指挥体制和军委—军种—部队的建设管理体制。

二、战区主战，攥紧打赢拳头

“战区主战”是“军委管总”总纲下的作战目，它勾勒的是军委之下的作战指挥线。即在军委（联指）战略全局统领下，具体战略战役指挥权向下集于战区，由战区担当所辖战略方向上战略战役的筹划计划、联合想定和作战指挥。战区的核心职能在“战”，发挥战区主导联合作战的战斗力“输出”功能，为打赢攥紧拳头。

（一）“战区主战”是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指挥重心下移的必然趋势

现代战争是联合战争，其制胜规律也尽在“联合”二字。联合意味着胜利。尽管机械化时代也需要“联”，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指挥措施的统一（而不是相互合作）已经成为必需”，但信息化时代的“联”，已经不再是“平台联”，而是进入一体化的“信息联”。流程成为整个组织设计的核心，成为军队的生命线。由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共同灌注的作战力量一体化和作战方式一体化，日益成为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形态。在这一形态下，组织的自治能力、主协同能力都极大增强，同时也使联合指挥重心下移、指挥权下行以及“任务式命令”控制成为可能，而且从理论上来说，联合的层次越低，联合的效果越好。

无论从现代局部战争还是从世界各大国军队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设置看，联合作战筹划和指挥重心下移是一个共同趋势，而且作战指挥重心大都向战略性战役即战区层面过渡，为其做实做强配齐作战指挥要素，使其具备独立筹划、准备和指挥战略方向作战行动的能力是各国普遍做法。比如，美军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在战区司令部，通过它对所属军种部队及战时配属部队全权行使作战指挥权，“各战区司令官有权决定如何组织和实施作战（不受五角大楼的政治压力）”。俄军从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经验中认识到，传统过度集权的指挥体制——总参谋部直接介入战区指挥——已不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需要向战区适度放权。目前，俄罗斯战略方向作战的指挥重心在联合战略司令部，总参谋部保留职能领域的作战指挥。

我军单靠陆军打近战、打地面战的国土防御时代早已过去，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一定是外向的、联合的、高度信息化的，没有哪个军种可以包打天下。落实“战区主战”就是顺应联合作战指挥方式发展要求，适度下放指挥权，将战略方向联合作战指挥重心下移至战区，在战区层面真正使诸军兵种作战力量统起来、联起来、用起来。

（二）“战区主战”是战略方向实现作战指挥权横向集权的重要保证

实现战略方向上诸军兵种指挥权的集中统一，是打赢现代联合作战的首要条件，也是“战区主战”的逻辑前提。但现代军事史的发展表明，“联合”的战略需求并不必然带来军种的自觉联合，军种指挥权是军种利益攸关的重大关切，同时也是使“联合”受挫的最大根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俄罗斯军队历次改革的一条主线，几乎无一例外围绕“统一指挥”，即剥离军种指挥权而展开。然而，作为回应，军种对指挥权的偏爱，也几乎无一例外令每次改革都留下遗憾。美军史上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防立法”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即《1986年国防部改组法》，虽从法律层面彻底结束了军种对作战指挥的干预，建立了相对成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但经过较长时期

才逐步削弱军种对作战指挥链的不利影响。俄军则经过多次反复，才在最近的“新面貌”改革中真正剥离了军种指挥权。

从我军情况看，传统大军区体制下，军区联合作战指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军种部队指挥权事实上仍掌握在各自军种手中，军区虽负责组织战略方向联合作战，但有责无权，而且军区本身大量的“非战”职能，也注定军区不是理想的主战实体。因此，落实“战区主战”，必须突出战区在战略方向上作战指挥的主体地位，剥离军种作战指挥权，使其横向集中于战区，真正实现作战指挥链上各军种、各作战力量的融合指挥与使用，确保形成强有力的综合作战力量集群。

当然，落实“战区主战”，并不是说战区不能有作战指挥以外的其他职能，战区的其他职能如何，还要视具体国情军情而定。比如俄军，战区系由军区体制改造而来，因国土防御的战略基点没有变，所以战区仍保留了兵役、动员、地区防卫以及其他相应陆军管理业务等原属军区的部分职能。可以说，俄军的战区是既具作战指挥又具行政管理职能的集合体。但即便如此，从战区整体机构设置看，仍主要是确保其履行作战指挥核心职能，其他行政管理和保障机构则大大压缩。

（三）“战区主战”是军委（联指）战略指挥线的延伸

“战区主战”并非横空出世，独树一帜。“主”相对“统”而言，似目与纲的关系，“主”源于“总”。作为作战指挥链条中的一环，“战区主战”受命于统帅机构的战略领导，受制于统帅机构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挥。作战指挥线的源头在统帅机构。没有统帅机构的政治控制和战略统领，“战区主战”便会失去引领，变得名不符实。

此外，现代战争是高资源利用率、高消耗战争，没有统帅机构对战争资源的战略统筹，“战区主战”就无法实现。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大国普遍建立起了国家和战区两级作战指挥格局。比如美军，国家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即由总统和国防部长（经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参谋部）构成的国家指挥当局，位于作战指挥链的顶端，9个联合作战司令部（6个战区司令

部和3个职能司令部)属战区级作战指挥机构,负责地理或职能区域作战指挥。俄军国家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则由总统和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及总参谋部构成,总统在国防部长协助下依托总参指挥国家层级的联合作战,5个战区级联合战略司令部主要负责指挥辖区内各军种联合作战。

对我军而言,落实“战区主战”即意味着“军委(联指)—战区”两级作战指挥格局已然形成。除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和军种单独组织指挥的战略战役外,战区的仗怎么打则主要靠战区具体筹划、组织实施。

(四)“战区主战”重在强化战斗力“输出”功能

所谓“输出”,实际上是相对“输入”而言的,是指从内向外输送的过程。“输出”的过程实际是对“输入”原料的再加工再生产过程。“输出”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加工生产质量的高下。战斗力“输出”,所输出的是战斗效能,是打赢能力,是对原有作战功能的再塑造。

战区以作战为主业,就必须强化战斗力的“输出”功能。例如,美军各战区司令部均把作战指挥作为其核心职能,主要负责制定作战方案、提出用兵需求、指挥作战行动,其作战职能通过一系列较为周详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如《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不仅从行动指挥链上彻底解除了作战指挥的军种控制,还扩大了作战司令在统一指挥与行动细节上的权力,使其拥有了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威,提高了履职能力;不仅规定三军主要作战部队在不脱离军种建制的原则下,编入各联合作战司令部,确保战区司令在其“权限范围内保证力量投送部队的联合战备训练”,还通过授权参联会主席“处理作战司令提出的资源和兵力需求”,提高了“国防部对总司令需求的关注”。此外,在具体作战训练计划组织方面,该法案不仅首次指令由参联会主席负责制定联合条令和联合训练方针政策,为实施联合作战训练提供指南,还要求战区司令部为突发情况制订应急计划,包括“预有准备的计划”和“危机行动计划”,前者为各种潜在的战争和重大危机而备,后者则用于应对突发危机。可以说,筹划、演练、完善作战计划,构成了战区司令部日常工作的重点,也成为其提升战斗力的脚本。美军官兵曾表示,许

多作战行动在战前都经过反复演练，其艰苦和严酷程度甚至胜于之后的实战行动。2003年3月，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其中美军的主要依据就是“1003 较大规模战区战争”作战计划。

落实“战区主战”，就是要突出“战”对战区设计的核心牵引作用，要一切以战为本，围绕能战胜战做好备战，积极筹划计划、善谋深谋、实战实训，切实在提高“产品”——战斗力“输出”质量、提升联合打赢能力上见真章。

三、军种主建，锻造精锐兵力

“军种主建”是“军委管总”总纲下的建设目，它勾勒了军委之下的建设管理线。即在军委战略的统率下，部队建设管理权向下集于军种，由军种负责本军种的规划、发展、建设和管理。军种的核心职能在“建”，即发挥军种对战斗力的“输入”功能，为打赢锻造精兵利器。

（一）“军种主建”是联合作战背景下军种职能再造的必然要求

军种是军队在组织和体制编制构成上，依据战略使命、战场空间、作战属性和武器装备类型所进行的职能划分。军种的出现是社会形态演变的产物，正是工业时代大生产大分工，促进了军种的涌现和独立。军种出现的早期影响，是打破了先前既有的统帅部指挥管理作战部队的权力运行模式，军种成为部队与统帅部之间纵向指挥关系中一个新的指挥管理层。而各军种的涌现，在丰富作战力量体系的同时，也激励了新的指挥管理层级的横向扩张，管理指挥体系“烟囱”林立的格局就此形成，军种间利益纷争与对立日益加剧。

然而，军种涌现并各自争利的背后，新的军种危机也悄然来临，“联合”成为军种必须面对的选项，单一军种独当一面的机会愈来愈少，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或一支部队能够发挥其全部潜力，除非它们与其他军种的互补

能力一起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证明是各军种能够在不影响战斗效能的情况下完全保持自治的最后一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联合作战便应运而生。期间，英国率先成为在各军种间协调作战行动的国家，但此时的“联合”是低水平的。美英盟军的指挥经验证明，军种至上、交互纷争、职责不清是导致联合作战指挥效能低的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防部体制兴起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力求在战略层次上解决军种内耗造成的作战指挥不统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之后，联合作战的成熟越来越被看作影响作战方式、进而影响军事力量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统一军种指挥职能是大势所趋。信息时代，联合作战方式的推陈出新要求军种必须重塑职能，即军种不能继续主抓作战指挥线。落实“军种主建”，就是要让军种从集管理、指挥于一身的“全能”型向专职“管理”型转变，变军种管理指挥一体为“军种主建”。

（二）“军种主建”是深入推进我军军事力量体系建设的战略抉择

拳头硬不硬，靠的是军事力量强不强。军事力量体系建设的水平反映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军事大国军事力量体系建设的规律表明，军种既是军队作战力量组成的基石，也是推进军事力量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依靠和关键角色。这得益于“军种主建”。在这个意义上，军种职能向“主建”聚焦转轨，尽管是实现联合作战“统一指挥”的必然要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军种主建”也为军种乃至整个军事力量体系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专于“主建”，可以让军种所具有的战略预置性、专业性、系统性、平台性特点，在建设管理上的优势愈发明显。特别是在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过程中，战争形态和技术形态快速演变下，各种军事力量建立、分化、组合越来越快，军事力量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组织结构日趋复杂，涉及领域越来越多，军种的专业性也越来越强。即便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脱胎于机械化时代的军种依旧是军事力量体系建设的主要载体。机械化和信息化是自动化发展的两个阶段，它们是密不可分的。缺席机械化

的信息化是不存在的；没有充分的机械化作奠基，欲登信息化之巅，只能是空谈。

军事力量体系建设更是一样。充分的机械化是军事力量腾飞的“翅膀”，而军种则是抚育“雄鹰”振翅的“鸟巢”。对于曾经是“小米加步枪”的我军而言，机械化水平起点较低，发展较慢，军事力量体系建设更需要依托军种来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我军整体建设水平有了快速提升，各军兵种建设进步喜人。但仍须清醒看到，与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大国相比，我军军事力量体系总体建设质量仍相对落后，特别是在具有抢占新军事领域制高点意义的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目标坚定，任务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好军种这个平台，以“军种主建”拉动军事力量体系建设快速健康发展。

（三）“军种主建”是建强军委统揽下建设管理形态的重要举措

军队建设，兹事体大。在传统的大总部、大陆军、大军区及政令合一体制下，军队建设管理结构性矛盾突出，管理多头、政出多门、职权交错、效率低下等现象普遍存在：大总部体制下，四总部事实上的领导层级，不仅阻隔并严重弱化了军委的战略统筹功能，也使军种建设失去了自我规划、经略发展的主导；大陆军体制下，不仅“非陆军”兵种建设因“陆军独大”体制，缺少平等战略关照而使发展受限，陆军自身也因缺乏独立的军种领导机构而“形巨体虚”，陆军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严重不足；大军区体制下，虽军区身兼军区陆军领导机关，负军区陆军管建之责，但因缺少陆军建设总体明确的发展战略，“军区化”建设、“碎片化”结果，反而影响陆军整体建设效果。

同时，军区因兼负联合作战指挥、兵役动员、地区防卫等多项职能，也客观影响了其在军种建设上的聚焦用力；“政令合一”体制下，军种既求建设又谋作战，尤其在军种战略要素明显短缺的情况下，军政军令之间易形成相互干扰和掣肘，致使军种建设总体水平低位运行。落实“军种主建”，明

确“建”的主体在军种，由军种领衔军队建设管理，不仅清除了军队建设管理上的种种障碍，使建设管理链路更加清晰简洁精干，也因军种发展更加均衡，责权更加明确，使军队建设管理更具战略性、系统性、全局性。

当然，“军种主建”不是军种“独”建，而是在“军委管总”，在军委政治统领，战略统筹、规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军种建设管理上的优越性、主动性、能动性来主抓建设。

（四）“军种主建”重在强化战斗力“输入”功能

军种的主业在“建”，“建”的目的当然是用，建得好方能用得顺。军队由军种组成，军种“生成军队”。简单说，军种的任务在于组织培训人员并发展武器装备，当然军种不同，培训和采购的行业规则 and 标准也不同。

所谓“输入”，是指从外向内输送的过程。军种“建”的过程，就是“输入”的过程，就是“成军”的过程。美军认为，“输入”指军种“为其部队配备人员、提供装备和实施训练”。经“输入”程序生成的部队，随后分配给联合部队，供联合部队司令使用。在“建”和“用”的关系上，美军通常把军种（包括国防部各直属业务局）定位为“产品提供商”，“用户”则是战区各作战司令部，前者有义务为后者提供所要求的各种资源，而后者是否满意则是判断各类支援保障行动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现代战争条件下，“联合”正显著地成为军种战斗力“输入”的一个鲜明脚注。军种能否在功能上满足联合作战——“输出”端能力要求，是对军种“输入”功能的重要检验。美军在《2010年联合构想》中就曾明确提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军事活动的每一个阶段，从训练到作战都要合作。”实际上，后《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时代，“输入”领域存在的军种间竞争已经有了质的变化：虽然竞争仍然存在，但已被限定在一个“联合”的框架内，“集中于一个比以前大为改进和重要的问题上——如何最有效地为增强联合部队司令的作战效能这一共同目的提供军事能力”。

我军落实“军种主建”，要“建”得让用户即“战区”满意，就必须突出军种战斗力“输入”功能，将如何建、怎样建作为主要思考的立足点和着